

## Aquatic Plant Pattern in Ba-Shu Culture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 战国时期巴蜀文化水草纹符号试析

严志斌 Yan Zhibin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710

洪梅 Hong Mei

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 100006

### 内容提要:

文章通过对27件𦉳符号的器物分析, 认为𦉳符号的使用流行在战国时期, 战国中期晚段与晚期早段相对集中。从地域上来看, 𦉳符号的使用是从川西的蜀人区开始的, 尤以成都附近最为集中, 战国中、晚期时向南、北、东扩展至巴蜀全境, 成都一地的使用情况却相对减少。使用𦉳符号的器物目前只见有铜矛、铜剑、铜戈三类兵器, 与器物种类密切相关。𦉳符号的组合有由简单到复杂再到简单的过程, 符号间组合的复杂化不代表族群的分化, 而是概念表述的繁化与细化。𦉳符号较集中地出现在荣经县北郊同心村墓地、什邡市城关战国墓地、宣汉县罗家坝墓地。族属上, 𦉳符号不具有族属符号的性质。𦉳符号在蜀人区多出现在高等级墓葬中, 高于巴人区出现的墓葬等级, 但都没有标示社会等级的含义。

### 关键词:

巴蜀文化 巴蜀符号 水草纹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n the 27 articles with the symbol 𦉳, the current authors believe that the symbol 𦉳 was a popular pattern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especially in the middle and late stages. In the geographical sense, the symbol 𦉳 initially appeared in the Shu region in western Sichuan, particularly being concentrated at Chengdu and its nearby area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stag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ts application had spread southwardly, northwardly and eastwardly to the whole Ba-Shu area while it emerged less in Chengdu. At present, the discovered articles with 𦉳 symbols merely include three types of weapons such as bronze spears, swords and dagger-axes. The symbol composition follows the way from simple to complex and then becomes simple again. The complication of the symbol composition represents the complication and elaboration of the conception rather than the division of ethnic group. The symbol 𦉳 intensively appeared in the Tongxin cemetery in the northern suburb of Xingjing County, the Chengguan Warring States cemetery in Shifang City and Luojiaba cemetery in Xuanhan County. The symbol 𦉳 isn't the mark of an ethnicity. The symbols 𦉳 frequently appear in the high-level tombs in Shu people region. Though the tomb rank is higher than those in Ba region, the symbols do not indicate the social class.

**Key Words:** Ba-Shu culture; Ba-Shu symbol; aquatic plant pattern

战国时期巴蜀文化器物上常见如下一类符号(图一)。为便于指称,笔者称之为水草纹符号。这种水草纹符号是巴蜀符号中很有特色的符号,下文对这类符号的出现情况略作分析。



图一 水草纹符号举例

铸有这种符号的巴蜀文化器物有如下 27 件。

### 1. 铜矛

1964 年于四川省成都市百花潭出土<sup>[1]</sup>, 通长 22.3、宽 3 厘米。骹部有符号“虎𧈧𧈧𧈧𧈧𧈧𧈧”。该矛短骹、双弓形耳, 中脊隆起直达矛尖(图二)。出该矛的墓为狭长方形竖穴土坑船棺葬, 方向 190 度, 坑长 3.06、宽 0.9、深约 1.5 米。出土器物丰富, 共 48 件。其中陶器仅有一件尖底盏, 余均为铜器。铜器有巴蜀特色的兵器铜戈、矛、剑等, 工具有斧、斤、凿等。容器有釜、釜甑等。还有中原的铜礼器如壶、鼎。宋治民先生认为该墓时代应属战国早期早段<sup>[2]</sup>, 笔者从之。

### 2. 铜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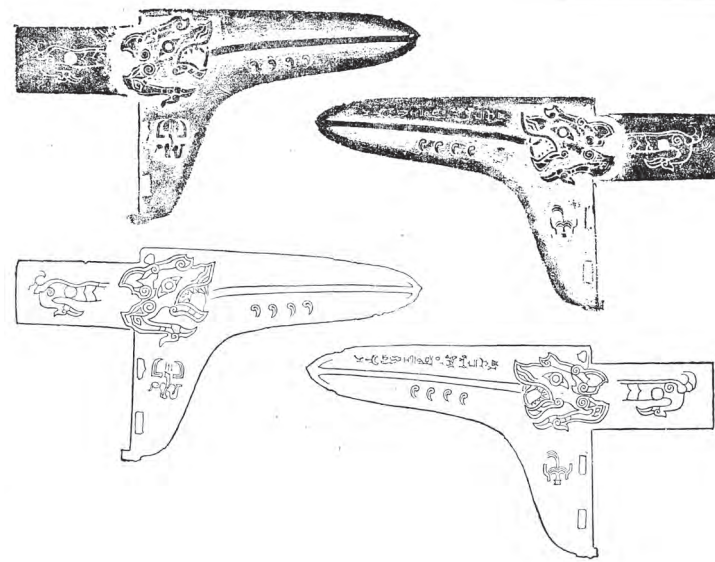
1972 年出土于四川省郫县红光公社独柏树墓葬<sup>[3]</sup>, 援长 17.8、内长 7.5 厘米。此戈长条形援较平直, 圆尖锋, 胡下端圆转有向后突的“牙”, 胡上有二长方形穿, 长方形内, 内上有一圆穿。侧身虎头在援本, 双耳翼翘起以固秘, 虎身在内部。胡部两侧有符号“𧈧, 𧈧𧈧𧈧”, 援上有一行字符(图三)。报告发表时说所有的铜器均为两个土坑墓所出, 但随葬器物没有分开, 单从戈的形制看, 此戈长胡三穿、方内, 平援尖锋, 形制上具有战国早期长胡戈的特点。

### 3. 铜戈

四川省成都外西石人坝出土<sup>[4]</sup>, 通长 20.7、栏宽 10.7 厘米。援上有符号“𧈧𧈧𧈧𧈧虎𧈧”



图二 四川省成都百花潭出土铜矛



图三 四川省郫县红光公社独柏树墓葬出土铜戈



图四 四川省成都外西石人坝出土铜戈

(图四)。该戈为长胡三穿，长方形内上一圆穿。援较长而直，隆脊，尖状锋，内较长，下部有缺。从形制上看，该戈时代应为战国早中期。

#### 4. 铜剑

四川省成都市西郊省水利设计院土坑墓 94CSM5: 23<sup>[5]</sup>，通长 30.6、身长 24.6 厘米。符号为“𧈧虎𧈧，𧈧𧈧𧈧”（图五）。M5 残长 5.1、宽 0.84 米。此剑茎身之间有明显界线，剑身长而宽，中起脊延伸到茎，脊两侧有血槽。该墓葬时代应为战国中期偏早。

#### 5. 铜矛

上海博物馆藏<sup>[6]</sup>。骹部有符号“? 𧈧虎? 𧈧𧈧𧈧”。该矛为短骹、弓形耳，尖锋，窄叶，

中脊凸隆(图六)。从器形来看,有战国中期的铜矛的特点。

### 6. 铜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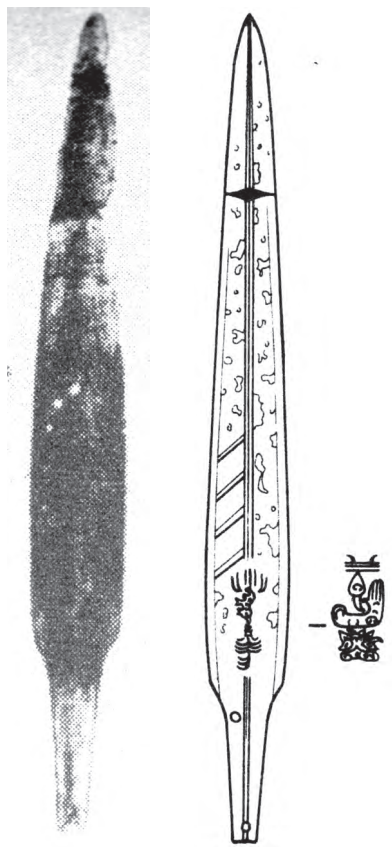
四川峨嵋县符溪乡柏香林出土<sup>[8]</sup>,骹部有符号“𧃟虎𧃟𧃟𧃟𧃟”。该矛为圆筒短骹,双弓形耳,中脊隆起直达矛尖(图七)。应为战国中期器物。

### 7. 铜戈

宛鹏飞所藏<sup>[9]</sup>。通长17.5、援长11.9、内长5.6厘米。内两面有符号“𧃟𧃟”。此戈长条形援较平直,圆尖锋,中胡,胡下端圆转有向后突的“牙”,胡上有二长方形穿,长方形内,内上有一圆穿。虎头在援本,双耳翼翘起以固柲,虎身尾在胡,身躯饰云雷纹(图八)。此戈的年代或在战国中期。

### 8. 铜戈

四川省宣汉县普光镇进化村罗家坝遗址M33:101<sup>[10]</sup>,通长24.5、援长16.5、内长8、内宽4.5厘米,此戈长条形援较平直,圆尖锋,中胡,胡下端圆转有向后突的“牙”,胡上有二长方形穿,长方形内,内上有一圆穿。援本饰侧身虎头,双耳翼翘起以固柲。内上有符号“𧃟𧃟𧃟” (图九)。罗家坝M33为曲尺形土坑墓,长6.62、宽4.6米,随葬品丰富,陶器有盘口罐、喇叭口罐、钵、平底罐、杯、尖底盏、釜等30多件;铜器有鼎、缶、甗、敦、壘、豆、



图五 四川省成都市西郊省水利设计院土坑墓铜剑(94CSM5:23)



图六 上海博物馆藏铜矛



图七 四川峨嵋县符溪乡柏香林出土铜矛





图八 宛鹏飞所藏铜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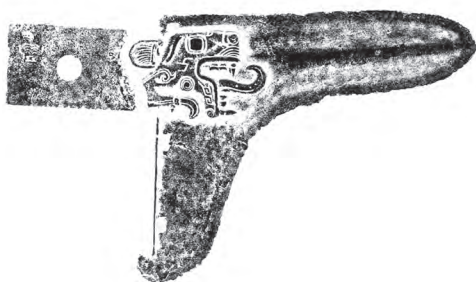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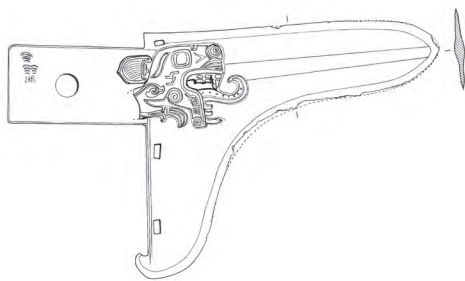
匜、勺、釜、釜、尖底盒、戈、矛、剑、钺、斤、锥、凿、削、刀、匕、锯、镞等120多件。且许多器物如兵器、工具成套配置。原报告定此墓的年代为战国早期。但从随葬品的形制上看，从战国早期到战国中期偏晚均有，故笔者认为该墓时代应当在战国中期偏晚。

### 9. 铜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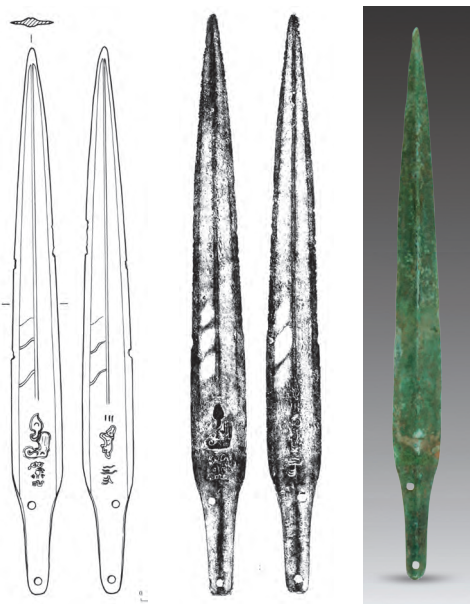
四川省宣汉县普光镇进化村罗家坝遗址 M5: 3<sup>[1]</sup>，通长45、宽4、茎长8厘米。剑身两侧有符号“𠄎𠄎，𠄎虎𠄎”（图一〇）。M5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3.34、宽0.95米，未见葬具及朽痕。骨架保存极差，仅存头骨和下肢骨，仰身直肢葬，头南，面向上。墓主盆骨和股骨上发现6枚箭镞，股骨上的箭镞直插入骨。随葬器物陶器12件，以豆为主，有8件，釜、圜底罐、高领罐和釜甑各1件。豆为中柄和矮柄，釜甑联体，釜小甑大，圜底，肩部以下饰纵向绳纹。铜器15件，以兵器为主，其中矛1件，剑1件，钺2件。工具有刻刀、锯、凿各1件。容器仅釜1件。其中剑中脊隆起，两从处有血槽，剑身较长，达45厘米；钺2件，束腰，圆形刃，体型较小，通长仅10厘米左右；矛，骨骹，宽叶，中脊圆隆，骹下两面有巴蜀符号。铜釜圜底近平，这些器物特征均符合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原报告认为该墓属战国中期偏晚，笔者从之。

### 10. 铜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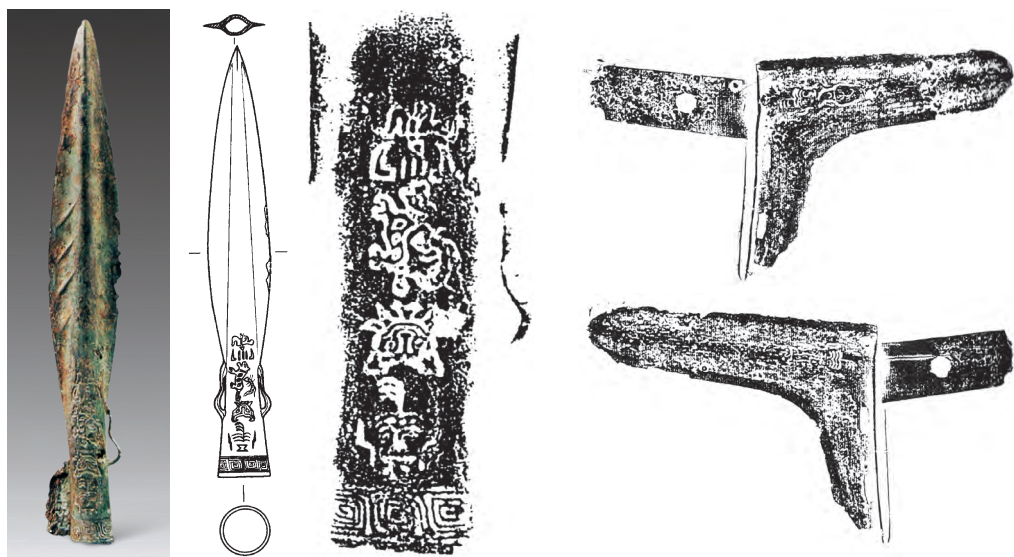
四川省什邡市城关战国墓 M23: 9<sup>[2]</sup>，



图九 四川省宣汉县普光镇进化村罗家坝遗址铜戈 (M33:101)



图一〇 四川省宣汉县普光镇进化村罗家坝遗址铜剑 (M5:3)



图一— 四川省什邡市城关战国墓出土铜矛 (M23:9)

图一二 四川省荣经县北郊同心村墓葬出土铜戈 (M21-A:30)

通长 24、骹长 6、叶宽 3.2、骹径 2.6 厘米。骹部有符号“𠄎虎𠄎𠄎𠄎𠄎” (图一—)。M23 为圆角狭长方形竖穴土坑船棺墓，墓口长 7.3、东宽 1.1、西宽 0.9、深 0.55 米，舱室长 6.2、宽 0.65、深 0.35 米。棺体西端略上翘，东端较平齐，舱底略有弧度。东西两端各烧凿有近长条状孔一个。尸骨大部已朽，位于舱室西部，头向东北，葬式不辨。随葬品置于舱室东端，铜器或置于尸体周围或置于舱室中部两边。该墓所出以铜器为主，陶器少，仅圜底罐和釜甑。兵器组合为剑、戈、矛、钺，剑身不过 40 厘米，中脊突出，未见血槽；钺束腰圆刃；矛中脊凸圆，均为战国中期晚段的形制特点。原报告认为该墓年代为战国中期晚段，笔者从之。

### 11. 铜戈

四川省荣经县北郊同心村墓葬 M21 - A : 30<sup>[13]</sup>，通长 21.8、援长 13.8、内长 7.8、内宽 2.8 厘米。援两面“𠄎𠄎𠄎𠄎，虎𠄎𠄎” (图一二)。荣经同心村 M21 - A 为狭长方形竖穴土坑船棺墓，基底长 6.7、宽 1.36、深 0.8 米。船棺长 4.5、宽 1 米，形如船，底圆平，中间微凹，两侧壁呈弧形，两端上翘。随葬器物共 73 件：计陶器 30 件、铜器 42 件、铁器 1 件、夹纆胎漆耳杯 1 件。铁器仅见铁削。原报告认为同心村这批墓葬均为战国晚期秦灭巴蜀之后戍边部队的墓葬。但笔者认为该墓兵器组合为矛、戈、剑，无钺；工具类有斤、凿、雕刀，铜容器有单耳釜和双耳釜，陶器以带豆为主，釜及圜底罐次之。除常见的巴蜀器物组合外，该墓还出有较少见的铜器甗、匜，以及漆耳杯和铁削。从形制上看，铜剑尖锋、弧刃，长度在 25 - 36.8 厘米之间，剑身弧脊有槽；长胡戈的援端较圆且上昂；矛中脊凸圆。这些特征均符合战国中期晚段的时代特点，该墓时代应为战国中期晚段。

### 12. 铜剑

四川省荣经县北郊同心村墓葬 M21 - B : 13<sup>[14]</sup>，通长 39.7、宽 3.4、茎长 7 厘米。符号为“𠄎𠄎𠄎𠄎，虎𠄎𠄎” (图一三)。此铜剑弧尖直刃，弧脊有槽，两侧及刃边铸有半圆形及虎斑纹，当属战国中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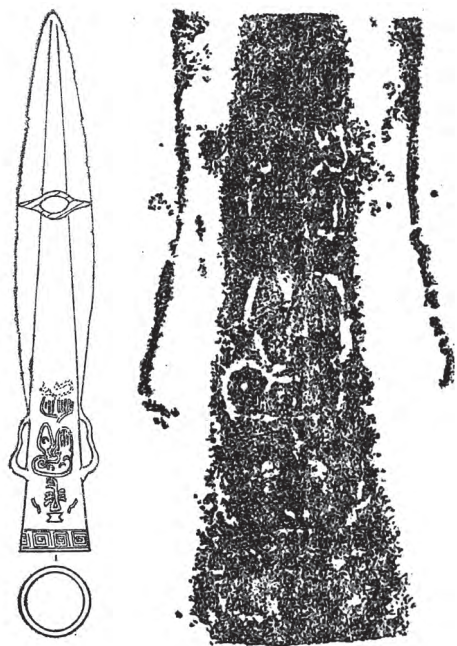
图一三 四川省荣经县北郊同心村墓葬出土铜剑 (M21-B:13)

### 13. 铜矛

重庆市云阳县高阳镇青树村李家坝墓地 M15: 1<sup>[5]</sup>, 通长 22.1 厘米。骹部两侧有符号“𧀮虎𧀮𧀮𧀮𧀮𧀮, 𧀮?” (图一四)。M15 发表的材料较少, 仅见该矛及一个陶平底小罐。从矛的形制来看, 尖锋、叶较宽, 弓形耳, 圆銜略扁, 圆脊略方, 符合战国中期晚段巴蜀矛的特点。而陶平底小罐, 泥质黑皮陶, 直口、窄沿、尖圆唇、平底, 圆折肩、腹部斜直, 器形较矮, 时代特点不明显。笔者认为该墓时代可能为战国中期晚段。



图一四 重庆市云阳县高阳镇青树村李家坝墓地出土铜矛 (M15:1)



图一五 四川荣经县附城乡南罗坝村墓葬出土铜矛 (M1:50)

### 14. 铜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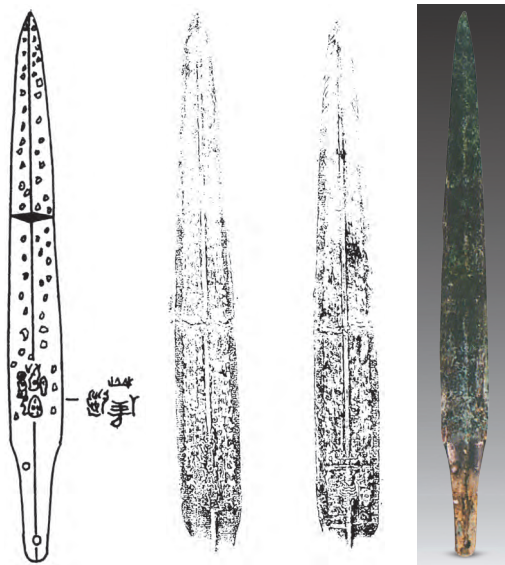
四川荣经县附城乡南罗坝村墓葬 M1: 50<sup>[6]</sup>, 通长 21.7 厘米。骹部有符号“𧀮𧀮𧀮𧀮𧀮, 𧀮?” (图一五)。M1 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墓底长 4.36、宽 1.26 米, 人骨已朽, 墓坑南端有头骨残片, 中部铜盆下有一段乱骨和腓骨。随葬器物共 75 件: 陶器有豆 38 件, 罐 8 件, 釜 4 件, 壘、孟、器盖、甑各 1 件, 置于墓坑两端。铜器有戈 2 件, 矛 5 件, 剑 3 件, 釜、盆、鬲各 2 件, 斧、钺、雕刀、削、凿各 1 件。戈、矛、钺放在头部附近, 剑、凿等置于腰部, 铜



容器主要放在墓坑两端。在基底中部，发现有大量漆器残痕。原报告认为该批墓葬时代为战国中晚期。从随葬器物组合看，铜兵器和工具各类齐全，铜容器有釜、盃、盆；陶器以豆为主，其次为罐、釜，有甑、孟等。从器物形制来看，矛分为长骹式和短骹式，均双弓形耳矛，鏃口呈圆形直达矛尖，中部剖面为橄榄核形；铜剑扁茎无格柳叶形，中间起脊，剖面呈菱形，通长 38.6 厘米；钺为扁圆形鏃，束腰有肩圆刃；斧亦为束腰圆刃；陶豆为短圈足，口微敛，方唇，浅弧腹。这些器物特点较符合战国中期晚段的巴蜀器物特征，故笔者认为该墓时代应为战国中期晚段。

### 15. 铜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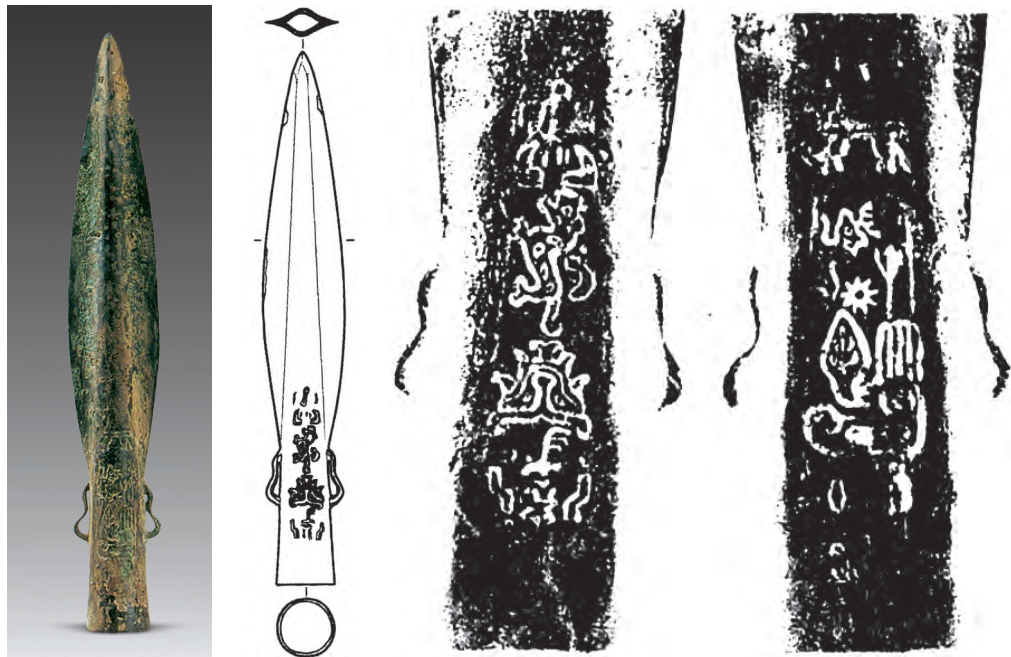
重庆市万州区新田镇五溪村曾家溪墓地 M12: 4<sup>[7]</sup>，长 40、宽 4 厘米。剑身两侧有符号：“𠃉𠃉𠃉𠃉𠃉𠃉𠃉𠃉?” (图一六)，部分符号不清。M12 为长方形土坑墓，坑口长 4、宽 3 米。随葬有玉璧、铜矛、铜剑、铜钺、削刀、铜盃、陶敦、高柄豆、三足盘、陶钵。原报告认为该墓时代为战国中晚期，笔者从之。



图一六 重庆市万州区新田镇五溪村曾家溪墓地出土铜剑 (M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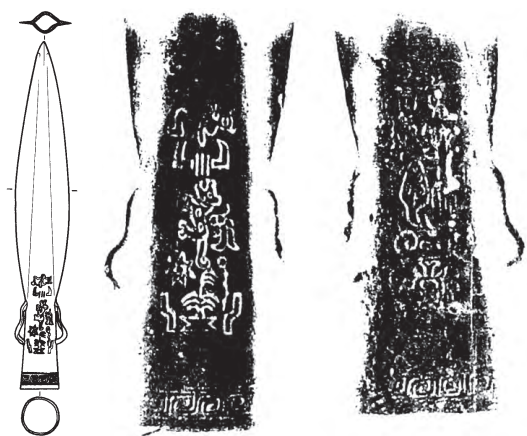
### 16. 铜矛

四川省什邡市城关战国墓 M14: 2<sup>[8]</sup>，通长 22.5、骹长 5.8、叶宽 3.4、骹径 2.5 厘米。符号组合复杂：“𠃉𠃉𠃉𠃉𠃉𠃉𠃉𠃉?” (图一七)。此铜矛中



图一七 四川省什邡市城关战国墓出土铜矛 (M14:2)








图一八 四川省什邡市城关战国墓出土铜矛 (M14:3)

脊圆凸，剖面呈菱形。原报告认为该墓时代为战国晚期早段，笔者从之。





### 17. 铜矛

四川省什邡市城关战国墓 M14 : 3<sup>[9]</sup>，通长 22.4、骹长 5.6、叶宽 3.5、骹径 2.5 厘米。骹两侧有符号“虎~Σγr, ?  
Q. 𠄎

”。M14 为圆角狭长方形竖穴土坑船棺葬，墓向 206°，墓室两端明显小于中部，坑极浅。墓口长 6.84、宽 1.2、深 0.25 米。船棺大部已朽，残存部分长 4.9、宽 0.6、残木块厚 0.08 米。残留尸骨下肢，直肢，足北头南。随葬品共 25 件。其中陶器 12 件：豆 6 件、釜 3 件，釜甑、壶、盆各 1 件。铜器 12 件：矛 3 件、戈 2 件、剑 2 件，钺、斤、削、鏃、带钩各 1 件。料珠 1 件。该墓为较典型的巴蜀墓船棺葬。器物组合兵器有剑戈矛，剑身较长，钺为束腰圆刃，矛为短骹凸圆，形制上符合战国中晚期特点。铜工具有削，铜容器有鏃，鏃的鏃手靠下，符合战国晚期早段特点。装饰物有带钩和料珠。陶器有釜、豆、釜甑、壶、盆等。盆是巴蜀墓中较少见的陶器类型，其出现可能与秦灭巴蜀有关。原报告认为该墓时代为战国晚期早段，笔者从之。



图一九 古越阁藏铜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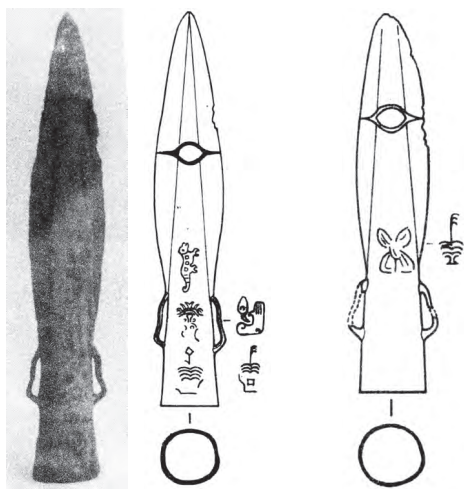
### 18. 铜矛

古越阁藏<sup>[20]</sup>，长 21、宽 3.2 厘米。符号为“虎Σγr, \*F Q. 𠄎

”。该矛短骹，弓形耳，中脊凸圆，制作精良（图一九）。从形制上看，该矛时代应为战国中期晚段到战国晚期（很可能是战国晚期早段）。

### 19. 铜矛

四川省成都市光荣小区 92CGM5 : 40<sup>[21]</sup>，通长 15.6、叶长 11.2、骹径 2.1 厘米。骹部两侧有符号“虎? γr, Q. 𠄎

”。


图二〇 四川省成都市光荣小区出土铜矛 (92CGM5:40)

图二一 四川省成都市光荣小区出土铜矛 (92CGM5: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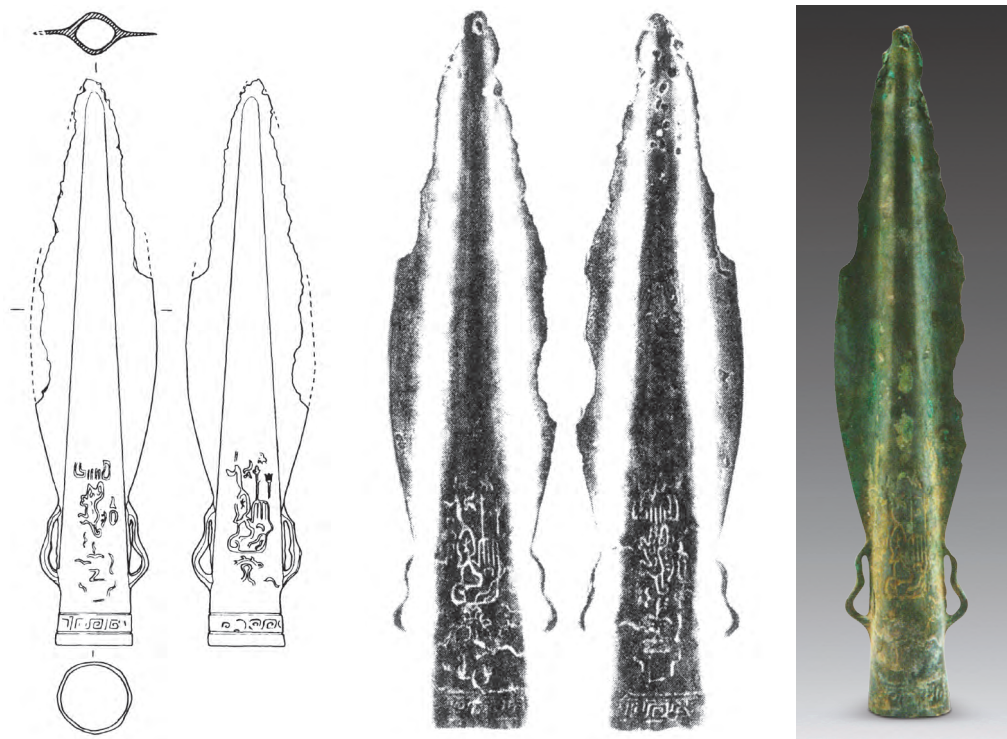
𠄎”（图二〇）。

### 20. 铜矛

四川省成都市光荣小区 92CGM5 : 39, 与上矛同墓所出骹部两侧有符号“𠄎, 𠄎”<sup>[22]</sup> (图二一)。原报告认为 92CGM5 时代的上限为秦灭巴蜀之后, 下限不晚于西汉初年。从墓葬形制看, M5 为近方形竖穴土坑木椁墓, 墓口长 9.65、宽 8.66、深 2.69 米, 墓底长 8.03、宽 5.65 米。东西坑壁有生土二层台, 宽 0.87、距墓口 1.5 米。葬具为一椁, 椁无盖板, 椁底由 11 根南北向方木平铺而成, 椁壁由卵石夹黄色粘土筑成, 椁室长 7.8、宽 3.8 米。方木下又有两根东西向的垫木, 垫木置于沟槽中。从随葬器物来看, 铜剑 7 件, 长度在 24.5 - 52.5 厘米之间, 较长者中脊凸起, 脊上有血槽。铜矛 6 件, 均双弓形耳, 中脊凸隆直达矛尖, 分长骹和短骹两种, 剖面从橄榄核形渐粗至圆形。刻刀刀身微拱, 断面呈弧形, 中起脊, 两侧起棱。这些均符合战国晚期巴蜀器物的特点。另该墓出有陶仓, 该物源于秦墓, 虽所出形制与关中秦墓所出有区别, 如门框处有卧虎, 但也表明了该墓应在秦灭巴蜀之后。该墓虽然被盗过, 仍能看出大量的巴蜀文化内涵, 同时也有秦文化因素, 故笔者认为该墓的年代应为秦灭巴蜀之后的战国晚期早段。

### 21. 铜矛

四川省宣汉县普光镇进化村罗家坝遗址 M31 : 28<sup>[23]</sup>, 通长 16.5、叶宽 3.6、骹口径 2.2、长 4.2 厘米。骹部有符号“𠄎虎 ★ 𠄎𠄎𠄎, 𠄎𠄎𠄎 𠄎𠄎𠄎” (图二二)。M31 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方向 210°, 墓圻长 4.6、宽 0.82 米, 未见葬具及朽痕。人骨仅存朽痕, 从朽痕判断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共 37 件, 其中陶器 11 件, 以豆为主, 另有鼎、盂器盖、圜底罐




















图二二 四川省宣汉县普光镇进化村罗家坝遗址出土铜矛 (M31:28)

和釜各1件。豆均为矮柄豆，鼎为釜形鼎，侈口束颈圆鼓腹圜底，矮足外撇，符合中原战国晚期陶鼎的特点。铜器共23件，以兵器为主，其中箭镞9件，另有钺、剑、戈、矛等，铜工具有削刀、凿。其中剑为柳叶形短茎，中脊隆起，两从有血槽，长38.4厘米；矛为短铤，中脊圆隆直达矛尖；戈中胡二穿，中起脊有阑，胡末向后凸出一牙。剑矛均铸有巴蜀符号。钺，无肩，椭圆形釜，圆刃，为巴蜀墓战国中期晚段常见形制。该墓中也出有不少装饰用品，如刻有浅浮雕虎的铜璜，还出有玉珠和料珠。综上，该墓时代应为战国晚期早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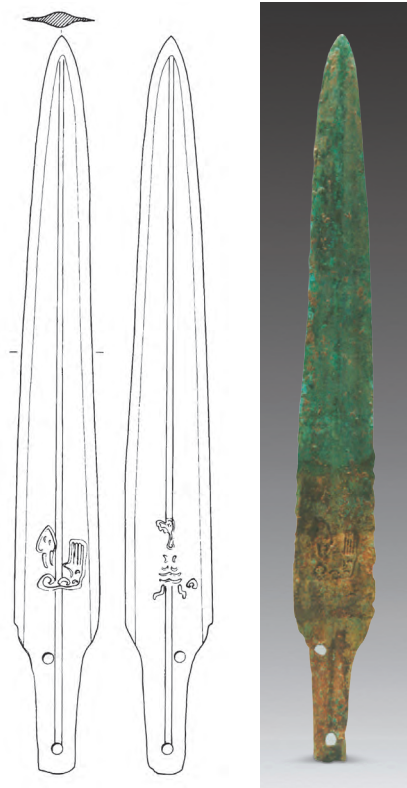
图二三 广汉文化馆藏铜矛

## 22. 铜矛

广汉文化馆藏，铤部有符号“                ”，虎★王鬻”<sup>[24]</sup>（图二三）。此矛年代在战国晚期的可能性为大。







## 23. 铜剑

四川省宣汉县普光镇进化村罗家坝遗址 M51:1<sup>[25]</sup>，通长33.2、宽3.9、茎长5.5厘米。剑身两侧有符号“ ，虎  (?)”（图二四）。M51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180°，长2.76米，宽1.20米，未发现葬具及朽痕。墓中2具人骨架，一短小一粗长，均为仰身直肢葬，头南面上。从骨骼长度看可能为儿童。随葬品共28件，其中陶器7件，豆3件、圜底罐4件，分别置于2具人骨脚下；铜器10件，兵器有剑和钺各1件，另有铜印章，铜镜各1件，铜手镯2件，铜箭镞4件。另有料珠、管珠、角珠。剑为柳叶形短茎无格剑，剑体较宽，约3.9厘米，通长33.2厘米。钺椭圆形釜，无肩，束腰弧形刃，为战国中期常见形制。陶釜为侈口圆唇束颈深腹圜底，豆有敛口和侈口两种，腹部较深，小圈足，符合战国晚期的形制特点。原报告定该墓时代为战国晚期偏早，笔者从之。



图二四 四川省宣汉县普光镇进化村罗家坝遗址出土铜剑 (M51:1)

## 24. 铜剑

四川省宣汉县普光镇进化村罗家坝遗址 M62:2<sup>[26]</sup>，通长36.6、宽3.7、茎长6厘米。剑身两侧有符号“虎   ”， ”（图二五）。M62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182°，长3.8、宽0.6米。未发现葬具及朽痕，人骨朽甚，仅存头骨和部分上肢骨，推测为侧身屈肢葬，头南面左，左手高举，右手不明。随葬品17件，其中陶器11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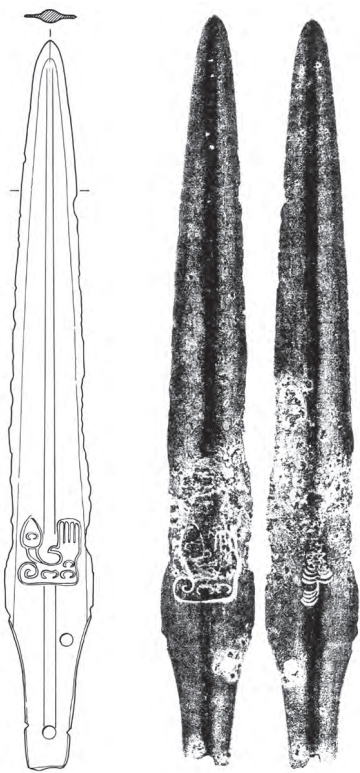
包括豆、圜底罐、器盖、釜、小平底罐、尖底盏；铜器 5 件，有剑、矛、戈、钺、箭镞。从器物组合看，豆釜圜底罐为巴蜀墓葬较常见的组合。从器形看，钺为有肩、椭圆釜、束腰、圆形刃；剑为柳叶形扁茎、无格，隆脊，通长 30.6 厘米；矛为长铤、窄叶、双弓形耳，中脊凸隆直达尖峰；戈为中长胡三穿，长援隆脊，有阑，阑下出齿，援上昂；陶器的豆深腹矮圈足，符合战国中晚期常见的形制特点。报告认为该墓为战国晚期早段，笔者从之。

### 25. 铜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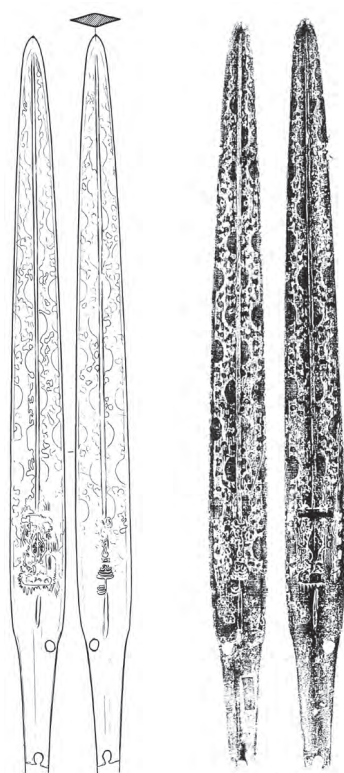
四川省荣经县北郊同心村墓葬 M16：17<sup>[27]</sup>，通长 45.5、宽 3.5、茎长 8.3 厘米。剑身有符号“𠄎𠄎𠄎，虎𠄎𠄎”（图二六）。M16 的时代当晚至战国晚期，在秦灭巴蜀之后。

### 26. 铜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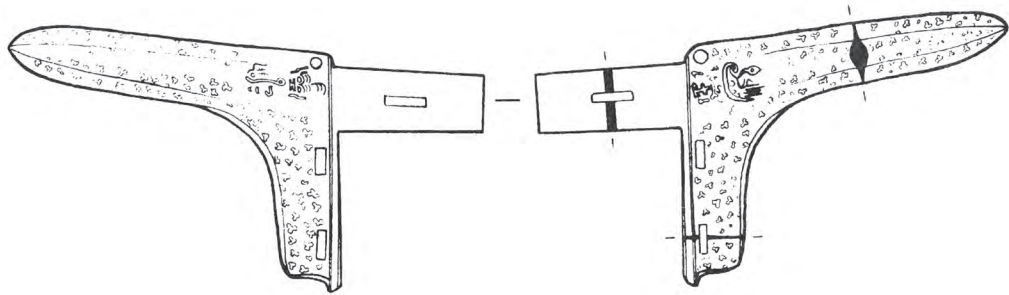
重庆市涪陵区白涛镇小田溪墓地 M10：32<sup>[28]</sup>，长 19.5、援长 13.2、内长 6.3 厘米。援本两侧有符号“𠄎𠄎𠄎𠄎？，𠄎𠄎？王”（图二七）。M10 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向 114°，墓口长 4、宽 1.4-1.65、墓底长 3.7、宽 1.2-1.4 米。葬具为一棺一槨，有熟土二层台，随葬器物 50 件，其中铜器 38 件，陶器 12 件。铜器有工具削、锯，兵器有戈、剑、矛、钺、盔形器，铜容器有釜、釜甑、盒、鸟形尊、壶、鼎等，陶器有陶釜、豆、罐等。该墓出有巴蜀特色的钺、剑、矛、釜、釜甑等，也出有中原的铜壶、鼎等。此墓还出有铜钱，虽然没有给出具体的介绍，但巴蜀墓葬出铜钱，时代必定在秦灭巴蜀之后的战国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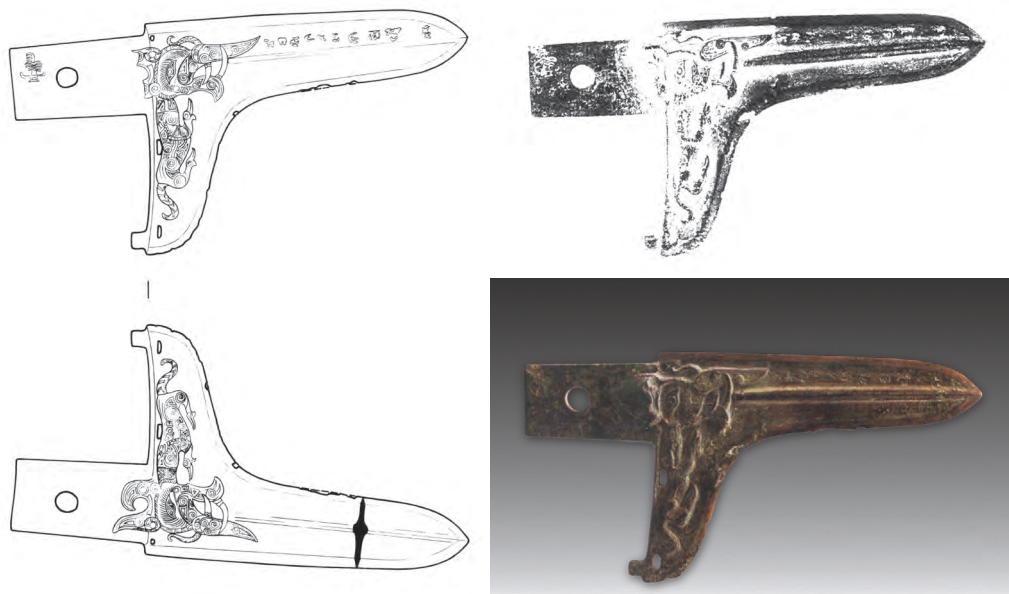
图二五 四川省宣汉县普光镇进化村罗家坝遗址出土铜剑 (M62:2)



图二六 四川省荣经县北郊同心村墓葬出土铜剑 (M16:17)



图二七 重庆市涪陵区白涛镇小田溪墓地出土铜戈 (M10:32)



图二八 四川省渠县土溪镇城坝遗址采集铜戈

## 27. 铜戈

四川省渠县土溪镇城坝遗址采集 (器号 01070), 通长 25.5、援长 18、内长 7.5、内宽 4.3 厘米。内上有符号“𠄎𠄎𠄎”<sup>[29]</sup> (图二八)。此戈为长条形援, 圆尖锋, 胡下端圆转有向后突的“牙”, 胡上有二长方形穿, 长方形内, 内上有一圆穿。侧身虎头在援本, 双耳翼翘起以固秘, 虎身在胡部。援上有一行字符。约为战国中晚期之物。

## 二

𠄎符号的使用流行时间在战国时期, 战国中期晚段与晚期早段相对集中, 这一时间段也正是巴蜀符号最为盛行的阶段。从地域来看, 𠄎符号的使用是从川西的蜀人区开始的, 尤以成都附近最为集中, 战国中、晚期时向南、北、东扩展至巴蜀全境, 成都一地的使用情况却相对减少了。

与𠄎符号组合出现频率最高的符号是𠄎𠄎 (92%), 其次是虎 (73%), 再次是𠄎 (65%), 复次是𠄎与𠄎 (45%)。𠄎 (31%)、𠄎 (23%)、★ (27%)、𠄎与𠄎 (15%) 稍逊,

而𠄎与王则各有二例。𠄎与𠄎符号组合出现频率高达 92% 的现象说明𠄎𠄎可能是一个复合式符号𠄎，而不是符号组合。只是𠄎与𠄎的组合有𠄎、𠄎、𠄎三种形态（有的可能是因为符号不清未能显示之故），笔者暂且都将其视作𠄎的异体。如 11 号同心村墓葬 M21 - A : 30 铜戈内一侧作“𠄎𠄎𠄎”，另一侧作“𠄎𠄎”，两者应该是等价的。再如下二例铜器，即 11 号荣经同心村 M21 - A : 30 铜戈，内两侧都出现𠄎，分别与其它符号组合成“𠄎𠄎𠄎𠄎（𠄎）”与“虎𠄎𠄎（𠄎）”，这里，因都与𠄎组合成固定组合，推测“虎”与“𠄎（𠄎之省）”的含义可能是相同的，也可能完全相反。笔者以为以意义相近同的可能性为大。同样的例子还见于 19 号成都光荣小区 92CGM5 : 40 铜矛上，也是“虎𠄎”与“𠄎”相对应。笔者以为这种与相同符号组合分列同一器两侧的符号用法，可以为理解这些符号的用意提供一种探索的途径。

关于𠄎符号的方向性问题，其在不同的器类上表现不同。13 件铜矛上𠄎符号皆与矛锋一致，即向上。7 件铜剑上𠄎符号皆指向剑茎，即与剑锋方向正相反（剑锋向上放置时，呈𠄎形）。6 件铜戈上𠄎符号的出现方式有 3 种：位于援部朝向内（3 件）、位于内部向上（2 件）、位于胡部向上（1 件）。𠄎符号在铜矛与铜剑上出现的情况与𠄎、𠄎、𠄎等符号的情况类似，皆在矛上与锋方向一致、在剑上与锋方向相反。笔者曾指出，铜剑在巴蜀人的观念中可能是以锋向下的方式作为正方向的，也即𠄎符号应该以𠄎为正方向，而不是以𠄎为正方向。

上文所举 27 例𠄎符铜器中，可以构拟出𠄎（𠄎）符号的组合逻辑变化过程：

𠄎𠄎𠄎（𠄎）（8 号） - 𠄎虎（5 号） - 𠄎虎𠄎（24 号） - 𠄎虎𠄎𠄎（9 号） - 𠄎虎𠄎𠄎𠄎（13 号） - 𠄎虎𠄎𠄎𠄎\*（17 号） - 𠄎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16 号）

这种渐次累加符号繁复的过程，有学者以为是族群分衍的表现，如果𠄎或虎是族群名的话，似乎是可能的，即新分化出的支族在母族名号下缀以新名以示出身，并与母族相区分。但这种逻辑有个问题，即在战国约 250 年的时间范围内，巴蜀的一个族群能否扩展到需加缀 15 个新名（如 18 号器，若将𠄎𠄎𠄎、𠄎各计为一个符号，也有 11 个新加缀的符号）以为新族的名号，虽然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如以 20 年为一代人，250 年也有 12 代人），但笔者仍觉得这样的人群分化现象过于严重了。而且符号中的“虎”虽有可能是巴蜀族群的表征，但这些符号中的𠄎、𠄎、𠄎诸符号出现的地域范围是跨文化跨族群的，它们似乎并不具备族群性的特征。由此，笔者不倾向于认为上述符号间组合的复杂化代表了族群的分化，而认为应该是概念表述的繁化与细化。

与𠄎符号组合的符号数量，最少的有 2 个符号，最多的达 16 个符号。从时段上来看，战国早中期阶段的是 3-8 个；战国晚期中段有的 2-15 个，以 10 个以上的多见；战国晚期末段的有 5-8 个。如表一所示，𠄎符号组合的符号数量在战国时期的变化趋势是先渐而增加，到战国晚期早段发展到最为繁复，到战国末期又呈现简化、少化的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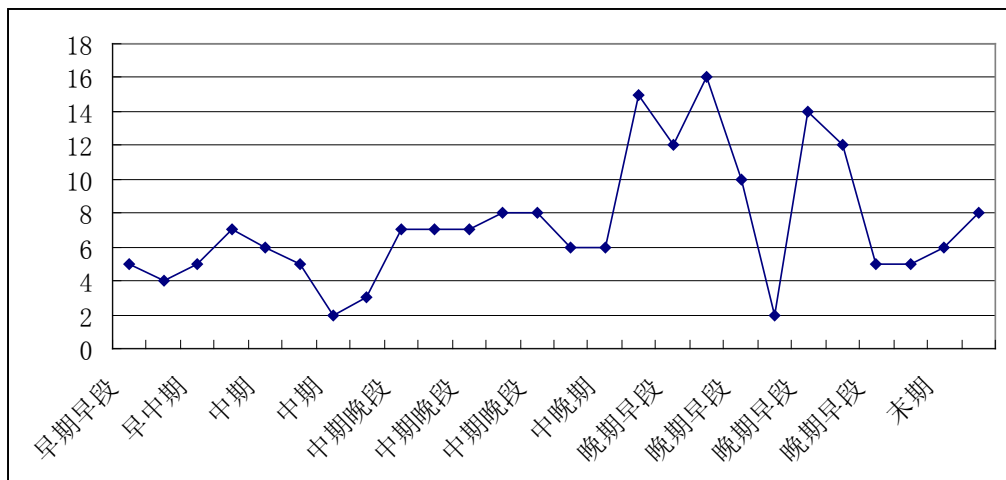
使用𠄎符号的器物仅见戈、剑、矛三种器类，说明𠄎符号只与兵器相关涉。战国中期以前戈、剑、矛均有出现，而战国晚期则少见有戈，而以剑、矛为主。这与巴蜀文化中戈、剑、矛三类兵器的使用状况相关。铜戈在战国晚期渐被弃用，战国晚期巴蜀兵士的作战模式与战国早中期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从地域上来看，川西平原蜀人区的铜戈使用较峡江地区的巴人区较多。

这 27 件器物中，有如下四组器物的符号组合模式是相同的。

第 1 组：7 号宛鹏飞所藏戈与 8 号罗家坝遗址 M33 : 101 戈。两戈均属于战国中期。



表一 𠄎符号组合的符号数量早晚变化表



第2组：3号战国早中期的成都外西石人坝出土戈与6号战国中期的峨嵋县符溪乡柏香林矛。

第3组：战国中期晚段的11号荣经同心村墓葬 M21A：30戈与战国晚期早段的24号宣汉罗家坝遗址 M62：2剑、23号宣汉罗家坝遗址 M51：1剑。

第4组：16号什邡市战国墓 M14：2矛与18号古越阁所藏矛。两矛均属战国晚期早段。

可惜宛鹏飞所藏戈与古越阁所藏矛不知出土地点，不好讨论。但第2组的戈与矛、第3组的戈与剑上符号相同，说明即𠄎、虎、𠄎、𠄎这4种符号的含义与戈、矛、剑的器物种类无关。而川西南的荣经同心村与川东北的宣汉罗家坝不同器类上出现相同的符号组合，说明𠄎是跨族群的符号。

关于战国巴蜀文化铜戈的族属，井中伟先生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对比他的铜戈分类与族属分析结果<sup>[30]</sup>，这6件铸有𠄎符号铜戈中，11号四川荣经同心村 M21-A：30、3号四川成都石人坝戈、26号重庆涪陵小田溪 M10：32、27号渠县城坝戈、7号宛鹏飞所藏戈等五戈属他划分的Cb、Ac型戈，俱为蜀戈；而2号四川郫县独柏树戈、8号四川宣汉罗家坝 M33：101二戈形制属于他划分的Ab、Aa型戈，为巴戈。这个族属分析结果与地域的关系并不能对应。如涪陵小田溪墓地学界习惯认为是巴人的墓葬，却出有“蜀戈”；而四川郫县独柏树墓葬常被认为是蜀人墓，却出土“巴戈”。由此也可以明确，𠄎符号不是具有族属性质的符号。若单纯从出土地域来看，也是如此。


### 三


𠄎符号较集中地出现在荣经县北郊同心村墓地、什邡市城关战国墓地、宣汉县罗家坝墓地。下面对𠄎符号在同一墓地中的分布情况稍作分析。





同心村墓地历年来发掘的35座墓中有27座的时代也在战国中晚期，另有8座年代可晚到秦或稍后。发表有墓坑数据的墓葬23座，可分为三个层级：3米以下的第一级墓1座；3米至6米间的第二级墓18座；6米至10米间的第三级墓3座。出有𠄎符号的M16、M21是同心村墓葬中规格等级最高一级墓葬，其中的M21是此墓地中墓坑最长的墓葬。





表二 墓葬规格统计表

编号	器类	时代	出土地点	器号	墓葬尺寸
1	矛	早期	成都市百花潭		3.06×0.9
4	剑	中期	成都市省水利设计院土坑墓	M5 : 23	残 5.1×0.84
11	戈	中期	荣经县北郊同心村墓葬	M21-A : 30	6.7×1.36
12	剑	中期	荣经县北郊同心村墓葬	M21-B : 13	5×1
25	剑	末期	荣经县北郊同心村墓葬	M16 : 17	6×1.7
14	矛	中期	荣经县南罗坝村墓葬	M1 : 50	4.36×1.26
10	矛	中期	什邡市城关战国墓	M23 : 9	7.3×1.1
16、17	矛	晚期	什邡市城关战国墓	M14 : 2、3	6.84×1.2
19、20	矛	晚期	成都市光荣小区	M5 : 39、40	9.65×8.66
8	戈	中期	宣汉县罗家坝遗址	M33 : 101	6.62×4.6
9	剑	中期	宣汉县罗家坝遗址	M5 : 3	3.34×0.95
21	矛	晚期	宣汉县罗家坝遗址	M31 : 28	4.6×0.82
23	剑	晚期	宣汉县罗家坝遗址	M51 : 1	2.76×1.20
24	剑	晚期	宣汉县罗家坝遗址	M62 : 2	3.8×0.6
13	矛	中期	云阳县李家坝墓地	M15 : 1	
15	剑	中晚期	重庆市万州区曾家溪墓地	M12 : 4	4×3
26	戈	末期	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墓地	M10 : 32	4×1.65

什邡城关墓地战国中期墓葬有 43 座，其中墓圪完整者 33 座<sup>[31]</sup>。这些中期墓葬中（不包括残墓），不见墓长 3 米以下的小型墓；墓长在 3—6 米间的中型墓有 19 座；墓长在 6 米以上的中大型墓葬 14 座。如此看来，什邡市城关战国墓地的墓主的层级分化并不是特别显著，而似乎只有第二、第三两个层级。出有符号器物的墓葬 M14、M23 在什邡城关墓地中皆为中大型墓葬，其墓主也当属当时人群社会的中上层。

荣经南罗坝墓地发表有 11 座墓葬，其中残墓 5 座。完整者据墓底长度可分为二级，3 米以下的第一级墓 2 座；3 米至 6 米间第二级墓 4 座，出有符号器物的墓葬 M1 处于第二级。但南罗坝墓地成员整体表现出社会层级不高的属性。

巴人区的宣汉罗家坝墓地也是符号器物的集中出土地。罗家坝墓地共发掘 65 座墓葬，据发掘报告，这 65 座墓中，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墓葬 1 座、战国早期墓 4 座、战国中期墓 24 座、战国晚期墓 16 座、战国末期至西汉早期墓 7 座、西汉中期墓 1 座<sup>[32]</sup>。由此可知罗家坝墓地使用的年代主要是战国中、晚期。出有带符号铜器的 M5、M33 为战国中期墓；M31、M51、M62 为战国晚期墓。罗家坝墓地战国中晚期的 40 座墓中，墓葬墓圪长度多在 3—5 米之间。墓圪长度在 5 米以上的共有 4 座。出土有符号的墓葬的长度有 3 米以下者（如 M51），也有 6 米以上者（如 M33，是罗家坝墓地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墓葬，应该是罗家坝墓地的顶层人物的墓葬）。由此看，符号在罗家坝墓地所使用的人群中似乎与人的社会层级没有必然的相关性。

统观出土有符号的蜀人区的墓葬与巴人区的墓葬（表二），川西的蜀人区的墓葬规格俱为 3 米以上的二、三级墓，6 米以上的大型墓多见；而渝北的巴人区则以 6 米以下的一、二级墓葬为主，6 米以上的大墓少见。这可能是两个族群墓俗不同的反映。尽管在蜀人区中、高等级墓葬更多地倾向于使用符号，但宣汉罗家坝墓地巴人对符号的使用是跨社会阶层的，说明符号总体而言不是社会等级的标示物。

注释：

- [1] 四川省博物馆编《巴蜀青铜器》，成都出版社、澳门紫云斋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第131页。
- [2] 宋治民：《略论四川战国秦墓葬的分期》，《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年。
- [3] 李复华：《四川郫县红光公社出土战国铜器》，《文物》1976年第10期。四川博物院：《四川博物院文物精品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46页。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13·巴蜀》，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30-131页。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天府藏珍——四川馆藏文物精华》，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第55页。
- [4] 四川省博物馆编《巴蜀青铜器》，成都出版社、澳门紫云斋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第148页。
- [5]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西郊省水利设计院土坑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4期。
- [6] 笔者见于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馆展厅。
- [7] 符号不清者以“？”代替，下同。
- [8] 陈黎清：《四川峨嵋县出土一批战国青铜器》，《考古》1986年第11期。
- [9] 宛鹏飞：《飞诺藏金》，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2-113页。
- [1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达州市文物管理所、宣汉县文物管理所：《宣汉罗家坝》，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154页。
- [11] 同[10]，第67页。
- [1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什邡市博物馆：《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文物出版社，2006年。
- [1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37页。
- [14] 同[13]，第251页。
- [15]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李家坝巴人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
- [16] 荣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四川荣经南罗坝村战国墓》，《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
- [17] 镇江博物馆、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市万州区文物管理所：《万州曾家溪墓地考古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科学出版社，2007年。
- [18][19] 同[12]，第84页。
- [20] 王振华：《商周青铜兵器》，第46号，古越阁，1993年。李学勤：《符号最多的巴蜀矛》，《文物》1995年第8期。
- [21]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光荣小区土坑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11期。
- [22] 同[21]，第26页。
- [23] 同[10]，第127页。
- [24] 刘瑛：《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文物资料丛刊》第7辑，文物出版社，1983年。
- [25] 同[10]，第229页。
- [26] 同[10]，第273页。
- [27] 同[13]，第251页。
- [28]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文物局：《涪陵小田溪墓群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中，科学出版社，2010年。
- [29]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渠县博物馆：《城坝遗址出土文物》，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3页。
- [30] 井中伟：《早期中国青铜戈·戟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72-291页。
- [31] 同[12]，附表一。下文所列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数据皆采自该表。
- [32] 同[10]，第344页统计表二。

(责任编辑 冯 峰)